

歧义的镜像

——对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另一种解读

安小庆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本文尝试解读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发掘其在革命叙事下潜藏的农村女性遭遇性侵犯/生存困境的歧义修辞。结合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本文从三个层次探讨这篇小说中的歧义修辞,指出主人公贞贞与“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异体同构关联。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歧义修辞隐喻了丁玲那一时期自我认同的困窘及其最终的化解方式。本文由此认为,这篇小说为丁玲转型前的心灵世界留下了零乱却真实的文本镜像。

【关键词】歧义修辞;革命;女性;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060-04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丁玲是可被称作那独特的“一个”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充满“传奇”和“流言”的人生和文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外研究者对其进行解读。对于她作品和本人的评论与研究,几乎从1927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一刻起延续到她已逝世近20年后的今天。

其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①(以下简称《霞村》)写于1940年底,是丁玲的众多代表作品之一。作品自发表的那一天起,便由于各种原因,伴随大量评论、争议和揣测存于文学史之中。以往对《霞村》的解读和研究,以“外部研究”^②为主,如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而很少扎根文本内部,从文本内部向外生发,综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研究方法,去探索文本复杂的意义生成机制。这里尝试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其加以重新阅读,发现其革命叙事下的歧义修辞,并对此加以合理阐释。

一 贞贞的“贞”

丁玲的《霞村》以“我”(从延安来霞村休养的女作家)的视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霞村15岁的少女刘贞贞与同村青年夏大宝相好。因不满父亲打算将她嫁给30岁的碾米店老板作填房,贞贞出走山下教堂,想做修女。哪知那日敌军来霞村扫荡,贞贞来不及逃脱,不幸被俘,遭到敌人侮辱,并被强迫做随营军妓。后和我方取得联系,继续留在敌营刺探情报,终身染恶疾。故事就从贞贞从前方回来治病开始,以“我”这个外来者的耳朵和眼睛来观察霞村各色人等面对贞贞的不同反应,追述之前发生的故事,并讲述主人公以后的出路。

小说的故事看似简单,但作品诞生后的几十年间,《霞村》与丁玲命运的紧密联系和相关的大量研究论述表明,《霞村》是一个蕴含诸多意义空间的巨

大海绵体。笔者将其命名为革命叙事中的女性遭受性侵犯和生存困境的歧义修辞。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层面对革命叙事中的女性遭受性侵犯和生存困境的歧义修辞展开探讨,从此打开进入《霞村》的另一扇窗。

二 革命叙事中的歧义修辞

现代小说理论和叙事理论认为,小说语言的变化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而关乎内容的变化;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一句话,语言和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③同样,小说叙述语言的异样,不仅是形式的可疑,而且密切地关乎小说的内容和意义。因此,要考察《霞村》中的歧义修辞,首先需要进入到其语言叙述层中。

(一) 语言叙述层

《霞村》的歧义修辞首先表现在文本的语言叙述层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这篇短篇小说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丁玲作品中那个久已消逝的、有判断的、有自我的叙述者——“我”。在仅20页的小说中,一旦涉及自我心理剖析和对主人公贞贞的描写和评价时,“我”便频繁的出现。如以下两例:

我不能睡去,便在灯底下整理着小箱子,翻着那些练习簿、相片,又削着几支铅笔。我显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觉着一种新的生活要到来以前的那种亢奋。我分配着我的时间,我要从明天起遵守规定下来的生活秩序。(第224页)

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话的确值得我们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我走的时候,她的家属在那里送我,只有她到村公所里去了,也再没有看见夏大宝。我心里并没有难受,我仿佛看见了地

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又将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第241页)

在文中,很多“我”字的删除并不影响表意的实现。在一个本来没有我的故事里加入“我”,并使用如此之多的“我”,似乎暗示了旺盛的表达欲望和迫切的讲述意愿;同时,这种迫切的意愿已经压倒了作家平时的理性书写原则。对于农村少女贞贞的故事,丁玲自己和文中的“我”是那样急迫想要了解这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甚至也许在这个“别人”的故事中说出了自己心里不方便说或者说是想说的话。

第二,在《霞村》的第一段讲到,因为政治部太嘈杂,“我”被莫俞同志安排到霞村休养,虽然身体已经复原,但“我”还是同意并决心好好休养,整理笔记。这看似平淡的一段意思,在整篇小说中,“我”却在不同的情形下多达八次以不同形式重复叙述了以上的意思,“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好好休养,不要多想,严格按照作息生活。

重复,一般说来,“是指本文中某些东西不至一次地反复呈现,而每一次呈现之间存在相似又有变化”。可以看出,《霞村》中的重复属于事件的重复,而每次的重复都含有“好好休养,不要多想,严格按照作息生活”的意思,但每一次的重复又有不同的变化。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术,其功能集中表现在,“通过重复某种东西,文化的一些隐言的或无意识的层面显露出来”。^④也许毛泽东在1941年8月2日《给肖军的信》可以给我们一个较为切实和直接的答案。信中写道,“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多想”或者说“想得多”,也可以换成“易感”、“易激动”等类女性/知识分子特质,或者也可以将只理解为一种个性主义者的秉性。由此看,文本中的八次重复讲述似乎在无意识地流露作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正痛苦地经历的一种心理过程。在文本中,作家的个性品质正被已进入革命组织工作的“我”有意无意地压制和规约着,显示出组织生活型态与个人生活节奏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使得作家无意识地在笔下进行重复叙述,意图既压制又宣泄无意识中的欲望,在压制中宣泄,在宣泄中压制。

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丁玲在文章里表达了自己曾经的心路历程。在读了《讲话》不久后,丁玲在自己将要出版的新书《陕北风光》校后记中这样写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

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过去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但到陕北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后的英雄主义”。^⑤这些对过去的剖析和回忆,与丁玲笔下的小说世界相互辉映、彼此关照,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重复叙述现象的出现。

分析了文本的表层——语言叙述层后,就可以进入到它所呈现的人物形象层。

(二) 人物形象层

在分析《霞村》歧义修辞的的人物形象层之前,将同有一个受侮辱受损害的女主人公的《霞村》与作为“高度政治象征化的革命经典叙事”^⑥范本的《白毛女》进行修辞性的互文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发现《霞村》人物形象在文本中的一些歧义叙述和断裂空白处。

《白毛女》中的喜儿置身于为光明王国(共产党人)和黑暗王国(以国民党为代表)所争夺的价值客体的位置上。她从父亲的女儿到地主的占有物,再到被拯救的女鬼,最终成为党的女儿,一直没有逃脱父系的控制和安排。以她为代表的这类女性注定历经苦难,被侮辱、被损害,直到一个男性的共产党人将她们救赎出苦海。返观《霞村》中的女主人公刘贞贞,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环节中她就已经逃逸出了父亲的安排(让15岁的她给30岁的米铺老板作填房),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然,贞贞不同于不属于任何一种大众的形式,诸如被拯救被解放或苦难的翻身妇女形象。从表面看,《霞村》中的贞贞具有以下两个含混的特征:

1. 形象与性格的杂糅。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贞贞至少混合和杂糅了莎菲+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女+ 抗日女英雄的性格和形象。丁玲以听来的一个故事作为素材写下了《霞村》,在描写农村少女贞贞的形貌时,我们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莎菲”的影子。在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喜欢中有热情的人;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丁玲自己也曾说过,“莎菲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得到她们的痕迹,像《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主角,精神里的东西,还是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

2. 个人与民族情感逻辑的混乱。在个人情感逻辑的变化上,贞贞与初恋情人夏天宝的情感变化在

本文中并没有清晰完整的交代,作者似乎并无特别兴致去进行这条情感逻辑的铺陈。同时,在表现贞贞的民族情感特别是贞贞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时,本文也显得较为含混和模糊,与相似题材作品中的叙述颇为异样。在经历了被日本侵略者抓获侮辱和做随营军妓长达一年半之久后,贞贞回到村里,在言谈之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

为什么丁玲在一个宏大的革命叙事中却没有再着笔墨渲染突出一种明确的民族情感呢?这似乎是一件容易想到也容易做到的事。在《霞村》的评价史上,这一直是遭到研究者们诟病的不足之处或不完美处。很多研究者也认为,在《霞村》中贞贞没有对过去表现出特别的悔意,也没有表现出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同时小说没有很好地表现她对夏大宝的情感变化逻辑,也没有很好地展现贞贞重新站起来的心理变化过程。笔者倒认为这些“不足”和“不完美”之处正是《霞村》这一文本的断裂和空白处,正是藉着这种也许是作家无意识的写作“缺陷”,有关女性遭受性侵犯和生存困境的歧义叙事才能得以进行。

(三)“贞贞”与“我”的异体同构关联

以上探讨了《霞村》在语言叙述和人物形象这两个层次的歧义修辞。若以上两个层次的歧义修辞的分析具有合理性,那么结合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交汇和映照,使“我”与贞贞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异体同构关联。“贞贞”是《霞村》中处境困窘的少女,而“我”指涉文本之外那时期的丁玲。具体来说,指涉了现实世界中拥有多重身份——女性、作家和革命者的丁玲。

我们都知道在丁玲的人生经历和评价史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是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直至1936年获救后的那段历史。当时,丁玲被密捕后,由于进步人士的呼吁和施压,国民党特务未敢将丁玲杀害,而把她秘密转至南京多处关押软禁。直到三年后的1936年9月,丁玲在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返回上海,后潜赴陕北,投向党的怀抱,作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丁玲是以“五四的女儿”的身份和个性主义者的气质跃上现代文坛的。这是丁玲少年和青年时

期对自己和别人对她的认同。但逃离南京反动派“魔窟”来到延安之后,她很快遭遇了身份危机和诚信危机。舆论认为她在关押期间有投敌行为。1940年组织部作出结论,“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①同年底,丁玲根据一个听来的故事创作了《霞村》。两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细读文本,笔者认为,丁玲对《霞村》的创作和贞贞人物的塑造,是作为作家丁玲在意识形态冲突和意识形态压力作用下的一种话语创造行为。丁玲无意识中希望通过话语修辞或话语实践这种活动,去象征性地解决现实中需要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这是一个作家最本能也是最适合的解决方式。在《霞村》中,通过正面和侧面描写,我们发现贞贞的精神活动亦复杂而频繁,笔者认为,在民族危亡、耻辱经历、恋爱问题、他人非议等这一切焦灼和不快的重压和围绕中,“贞贞”也像上面我们所分析的丁玲一样,产生了一种自我认同的困窘。文中对“贞贞”和“我”这两方面的描写,完整映照了丁玲那时期自我认同的困窘状况。

三 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层次探讨了《霞村》革命叙事下潜藏的歧义修辞,指出主人公贞贞与“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异体同构关联。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歧义修辞,隐喻了文本世界外——现实世界中,丁玲那一时期自我认同的困窘及其最终的化解方式。阅读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作者贯穿在这些作品的复杂内涵:一方面是对作为被歧视被压迫的女性的深深哀伤;另一方面慨叹了身处救亡与启蒙、个体与集体夹缝间,那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和挣扎。

不得不承认,在任何时代,话语都不是纯正的,“本文总是悖谬性的”,尤其在身处性别、政治、历史、身体、男权等诸多因素拘囿的敏感女作家那里。《霞村》在表层的意义之下,凸显了主体在多重因素交织之网中,徘徊挣扎的痛苦心灵,以及作家对性别宿命和女性救赎难于实现的隐忧。但这些歧义修辞所展现的矛盾、徘徊和混乱,都即将在丁玲不久后的选择中得以归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为即将转型前的丁玲心灵世界,留下了零乱却真实的文本镜像。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底,原载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一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本论文写作所参照的是《丁玲文集》第三卷中的版本(第221~24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凡引《我在霞村的时候》原文均出自此版,仅标明页码。

- ②参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152页。
- ③参见[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力河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
- ④王一川:《修辞论美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10~111页。
- ⑤丁玲:《丁玲自叙》,王增如、李燕平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39页。见《丁玲文集》第六卷《〈陕北风光〉校后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⑥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 ⑦丁玲:《魑魅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 [1]丁玲.丁玲全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2]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3]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4]周良沛.丁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 [5]杨桂欣.情爱丁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6]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7]杨联芬.革命文学的多余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8]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1998.
- [9]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1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1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2][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Ambiguous Mirror Image

——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When I Was in Xiacun*

AN Xiao-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erpret the short story *When I Was in Xiacun* written by Dingling and to explore the ambiguous rhetoric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living dilemma hidden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ccording to the espe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mbiguous rhetoric from three levels and addresses the main character "Zhenzhen" and narrator "I" have formed complicated relation of "two subjects but one type". This complicated but abundant rhetoric gives a metaphor out of context and in reality of self-recognition dilemma and the ultimate solution of Dingling in that period. Therefore, we have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When I Was in Xiacun* has left a messy but vivid text mirror image in Dingling's mind before her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Ambiguous Rhetoric; Revolution; Female; Sex